

1

历史变迁与领导心理导向

历史由永无遏尽的变迁结成链条，这链条不是别的，是手挽着手的人。

当今，世界新潮的主题和本质，并非是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或切割而又不得不交融相汇的“经济圈”，而是“人的突变”或“精神生产的突变”，是“人的革命”或“人的潜能开发运动”。

巴列维改革、两伊战争、巴勒斯坦运动、绿色和平组织以及英甘地遇刺，“铁娘子”连任，里根、基辛格的“在野服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霍梅尼身后余波……这些重大事件、从政行为及“政后现象”，并不仅仅基源和诱发于单一的经济利害关系，而且还有更深层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和政治心理的根源。

中国自鸦片战争迄今的一个半世纪来，不间断的战争，

一系列的变革，起不息的派系，无休止的纷争，反反复复的“乱”与“治”……革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陨落带来的茫然和震颤，林彪、“四人帮”的覆灭引出的惊悸和希冀，改革、开放颖生的振兴和复苏，学潮、党风、物价裹挟的“热点”和焦虑……唐山的“震兆之说”，大兴安岭大火的“民间评论”，甲肝流行的社会效应，八十年代的“龙年民谣”……过去的、现行的、自然的、社会的、民间的、政坛的，一次次希望，一幕幕悲剧，一桩桩事件，一回回转换，这一切，尽可以用成败、正误、进退、是非、曲直、迷悟、破立的评说，织铸“历史的公论”。然而，更需要用国民性格、政治心态、主体意识、人心归向来展现历史的潜在脉动。

这似乎为被奉若神明的“君权神授”、“民应君权”、“人治政治”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当我们找到创造文明的那双粗糙的手，又沿着手的脉动发现那颗跃动着火焰的心的时候，这种“合理性”也就不击自溃了。

中国历史的脉动，是以“人的渐变和突变”为节律的。现代领导活动由渐变到突变的飞跃，是以领导者观念体系、思维方式和心理深层的突变飞跃为主导的。对此，人们或许讳莫如深，领导者自身也许曾因难以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而疑虑重重。然而，当改革开放使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旧文化的框架趋于解体，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人格、政治心态急剧变化的时候，领导心理的地位、作用及价值取向也随之脱显于世并勃发着新的生机。当现代化所展现的宏大规模、交叉因素、多维结构、综合功能，要求当今领导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察问题、认识事

物，以运动、变化、渐进、有序、可控的观点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时候，领导者也就同时自尝了自身心理突变的痛苦和欢悦，进而从深沉的忧患走向理智的深层突变。

历史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心理文化”。中国当代领导心理，正是现实时空与社会大文化谱系结合的产儿，是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体系交汇相融的晶核。

那么，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征和主体动力是什么？领导心理所呈现的状态及随应和导引社会变革的机能是什么？历史变迁与领导心理是怎样共鸣交振，形成与时代相应的节律的？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深沉的理性思考进行透视、分析、探索，更需要当今领导以执着的责任感作出反省、审视和深究。

1.1 历史变迁并非人格化权威主导

历史的急剧变迁，催生、簇拥着文明，也化解、透视着扑朔迷离的领导心理世界。

一、历史的结论与“联想”的情景

人的心理和意识起源这个宇宙间的迷宫已被揭破，微妙纷呈的个性心理的本质特性也得到科学的揭示。无论是宏观的人类意识，还是微观的个性，其产生、发展和变化，都不可易移地从属于社会整体变化的规定性，服从并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服务于人类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目的。

然而，结论总是抽象的，它不能溯及万端、包罗万象，也难以说明一切必然的和偶然的历史事件。当我们把上述结论推演于“历史变迁与领导心理”这一对特定范畴的时候，人们或许会思古及今，进入浮想联翩的情景之中。

在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人格化的权威导引着历史的变迁吗？秦王嬴政“称雄天下一主”、“兼并经世一宗”的心态，驱使他如愿以偿地在中国实现了“统一”，首创了“专制”，发明了后人沿用两千年之久的“皇帝”；慈禧太后的生性凶险、必欲执朝、淫威忌变，使戊戌维新仅维持103天便以六君子的就义而告结束。13年之后的辛亥革命，也因军阀的凶悍强夺，使共和国的旗帜霉变斑裂，撕成碎片；蒋介石的虐狂、狡诈、残忍曾使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更加阴森恐怖……历史的契机，奇妙的一瞬，也似乎全在于一君的明惑：公元65年，中国帝王酣睡梦识释迦牟尼，由此引起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8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开放，在一个帝王的梦中实现了。然而，乾隆58年（1793年）秋季，英国使臣马甘尼来华请求准许通商。结果，乾隆深怀无限的文化优越感和“世界中心意识”，在自恃“世界帝国”的傲慢中，即降敕谕，断然拒绝。由此筑起高墙，又自外于世界潮流。开放，在一个骄横的帝王怀中变成“死胎”。不同人的心态，有不同的历史作为，而同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变化，似乎也预示、牵动、展现着历史的轨迹。中国出现过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早年“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萌动，曾使他坚执地投身革命，并以他特有的气质与雄才大略，和人民一起向旧世界宣战，铸造了历史的丰碑。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会在黑

暗中苦斗。而在晚年，他仍然思忖着中国的未来，深深地忧虑着“资本主义随时会在中国复辟”，并把这种“忧患”变为“肃内戒外”的行动，进而以超常的气魄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本来贫弱的中国推向灾难。而当这位伟人安息、长眠之时，中国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迅即降生了。

在域外的众多事变中，不是巨人的心态、伟人的巨臂在拨动着历史吗？拿破仑扬言，他的意志能压倒一切，凡是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必定会归他所有。结果，他确实获得了诸如“雾月政变”成功一类的希望中的许多东西。沙皇彼得大帝厌恶正教教会对其胡须的崇拜，便在推行改革中发动了一次全国居民剪胡须的运动。要留胡须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并且留须人必须把印有胡子图案和“须税收讫”字样的铜牌挂在脖子上。非洲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为满足自己的尊荣欲，颇使臣民见国王时不仅要匍匐在地，而且要说：“我不是人，我只是一条狗，一块木头。”

当代中国改革中的领导者们，能管辖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改革就与他的个性特征不可分割；能管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兴衰成败就与他的明惑能庸联在一起。一个县一旦有了一个“顾荣”，就阴霾重重，而来一个“李向南”，就有了“青天”；步鑫生的沉浮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沉浮；一个善搞任人唯亲的领导，能把一个单位变成“家天下”；一个副县长能使一个受害报案的姑娘变成“自首犯”^①……领导者的喜怒哀乐、善善恶恶，预示着改革的盛衰成败……

这一切，无不使人感到：古今中外的帝王、诸侯、政治

^① 《文摘报》：《报案人怎样变成自首犯？》 1987年11月5日。

家、领袖人物以及各层位的领导者们，他们的心理品质、个性特征，或光明磊落或奸诈诡谲、或坚执勇为或懦弱昏庸、或爽直豁达或神秘怪癖、或善善恶恶或多疑残忍，都足以对历史造成影响。

二、理性的“联想”与结论的思考

不可否认，人类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水平，是人类在既有意识的指导下，凭借着领导者率领的有组织的群体，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的结果。其间领导者的心理状态，认知、情感、意志的品质，需要、动机、兴趣、信念、世界观以及能力、气质、性格的素质，都无疑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时代的精神、民族的情感甚至历史的进程不可分割。

然而，当我们着眼现实的历史时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领导心理进行总体观察和分析时，就会获得新的感知和结论。

首先，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上看，每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都制约着领导者的意识和心理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人类根据自己的意识去行动，领导者根据自己的愿望、好恶、目标去选择，都要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约束。秦王嬴政能够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是顺应历史潮流，以秦国商鞅变法后的强大为基础的产物，而决不仅仅是“称雄”一统的心态映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深信“欲以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英雄何其多？然而又有多少不是“深信而重失”呢？嬴政号称始皇帝，其意在“以世计数”，传之无穷。这种“秦氏家天下，当与日月同”的心

态，也在“二世二亡”中旋即破灭。历史时有血腥逆动的一幕，但血腥的逆动决不能改变它前进的航道。慈禧太后能把变革扼杀于血泊之中，但她却不能绝灭其后生生不息、愈演愈烈的社会变革。心态可以超越历史阶段，但历史发展的链条却难以截断。毛泽东面对中国“一穷二白”的严酷现实，怀着美好的理想，倾注极大的热情，充满只争朝夕的精神，赞同“大跃进”，立志“超英赶美”，以图国家尽快富强。结果，“跃进”过去的不得不退回来，在拉大的差距上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现实的“新起点”。历史证明：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哪个历史阶段、哪种层位的领导者；也无论领导者如何心态激越、才能过人，如何情性成癖、昏庸无能，虽然都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航向。他们只能顺应历史潮流承前启后，而不能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的史前时期，一下子跳跃到现代文明社会。也不能使当今社会一下子飞跃到“大同世界”。他们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凭借社会的外力带来社会的曲折和灾难，但却无法使社会倒退到被盲目性支配的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期中去。人类根据自己的意识去行动，领导者根据自己的愿望、好恶和目标去选择，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约束。

人的意识作为人的一切自觉的认识、体验和意志等心理活动的总和，它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意识，并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人的意识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和不断发展。人的意识的发展服从于社会历史的规律，服务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人对自然界的意识和社会的意识，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人如果脱离了社会生活实践，就不可能掌握人类社会的语言 and 知识经验，就谈不上发展人的需要、情感、意志和智力。

从人的意识活动发展的水平和意识的内容特点来看，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人，其意识形式的心理过程和生理机制都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但它们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活动的深入、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

这一原理告诉我们，领导心理决不是领导者个人所具有的抽象属性，而是指作为一定历史阶段、一定阶级、集团并正在参与某种具体的领导活动的人的个别特性。具体地说，领导心理，是领导者个人在其前期生活的基础上，与领导活动的性质、任务、行为准则等方面的社会因素相协调、相融合而形成的特定的心理现象。领导活动的社会化和被称为社会化凝结物的领导心理，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每一变化都会与领导心理发生共鸣，并引起新的变化。

其次，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科学技术所组成的社会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0 页。

统的宏观上看，领导心理是社会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时势和经济、政治因素是领导心理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化必然引起领导心理的变化。同时，领导心理的状态、机能也必然作用于社会发展，使社会变化的节律或速或缓、力度或强或弱。着眼社会整体结构的观察，我们还会发现，历史决不是帝王、英雄和政治家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结果。领导权威的力量根植和发源于社会群体。权势及其力量归根到底也来源于社会群体成员“甘从”或“盲从”的心态与行为。“三岁的皇帝”主宰一个大国，无能的领导者把持一个企业，“伟人”的一怒之下、一笑之间、一言一笔能使一个世界变为两种面目……这一切正是由于社会形成了服从于某一个人的社会心理结构所产生的效应。这种被人格化、盲目性所支配的时代，正好说明任何权势者的个性心理品质都是权势社会化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的性质和结果都不是某一个人意志的造作。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这场内乱的酿成激出、险象环生、为祸之广之烈，一个重要的根源是社会形成了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心理结构和“左”的社会心理机制。这种心理结构和机制一经形成，领导者自身不仅难以从全局上认识和改变错误，也无力改变他已经意识到的许多弊端。毛泽东同志是这样，斯大林也是这样。当“个人崇拜”在苏联溶化的时候，斯大林不仅难以纠正他意识到的路线和政策上的错误，即使他不同意人事部要把他的儿子提升为上校，并把人事部主管人叫来训斥一通，但结果他的儿子反被提升为将军。斯大林的女儿对斯大林得出的结

论是：他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却无力反对那种制度。那个在他身边形成的“大蜂窝”。他不仅无力捣毁它，甚至监督它也不可能。这足以说明，领导心理品质的力度和强度决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社会历史，而只能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发挥一定作用。

再次，当我们追溯领导者的生活经历、所处环境及常规历史阶段和非常规历史事件对他们的影响时，我们还会发现，领导者的个性心理品质同样是个体社会化的凝结物或主体心理整体的社会规定性，是个人在自然素质的基础上，由社会的影响通过主体的活动而形成的稳固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人的个性的样式千差万别、千姿百态，而个性的社会化则是同一而不可剥离的。个性的充分完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动力，然而，社会的文化条件又按一定模式塑造着与之相适应的人的个性。封建社会“吃人”，实质上是指封建专制、礼教文化用吞噬人的个性的方式形成秩序，这种秩序又锻造并复制着主奴性的双重人格。有人说：在中国只有皇帝是自由的。其实，在礼治秩序中，皇帝虽处在千官之首、万民之上的金字塔顶尖，然而他仍需要遵从祖宗的成法、先辈的遗训。这样，就使他集暴戾与驯从为一身的双重人格脱显出来。历史上确有“为民请命”、“为民作主”的清官。但决无“与民同位”、“与民平等”的官吏。包拯秉性耿直、执法如山，但在他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下，死去的人都是有尊卑等级的。这是因为封建礼治文化，上下尊卑有序，各有其位，各有其份。人是上一级的奴才，又是下一级的主子，官官之间，假如他是大官的臣下而又是下官的上峰，那他就集奴颜卑膝和虎狼之性于一身。足见，

畸变的人格盖源于病态的社会文化。正如鲁迅所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①可见，从整体历史的角度看，领导心理对社会的任何超越和脱离都只能是“天方夜谭”。

同时，同一的历史事件（常规的或非常规的），不同的领导者会有不同的心理反映和不同的行为方式。然而，离开了这个“事件”，任何心理现象都无从谈起。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还可以看到，封闭的心态与开放的心态，二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发生的。或者在总体上就是“封闭”和“开放”这两种社会环境的代名词。在利马窦给明朝皇帝献出世界地图之前，中国当时还不知道地球有东半球西半球。直到清末，一些朝廷皇臣对世界还一无所知。即是大学士、义和团的幕后发动者徐桐，竟“连算术也斥之为洋鬼子的学问”。在他们看来，世界无非是一个中国和它周围的弹丸小国。对世界的无知产生“世界中心意识”，长期的闭关锁国又铸造了封闭的心理模式。当鸦片战争的炮火推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才使这种世界中心意识被彻底轰毁，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才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才有了从新的层面上观照他人、认识自己的可能。可见，开放不是在那一位开明君主的想象中成为现实的。同时，开放的真正实现也不仅仅是按着领导者的意志推进的。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谚语》。

毛泽东同志和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知封闭等于孤立、等于贫弱，并不计“华人与狗不能进”的前仇，在建国前、开国大典上都郑重声明，主张同任何外国政府实行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开放”。其心之殷切、志之坚执为世人皆知。然而，解放后的中国得到的却是列强们的全面封锁和无情扼制。谈何开放？领导者开放的心态没有结出开放的果实。它说明，心态现象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不可分割。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又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当今，领导者全面开放的心态。是在世界经济大融汇、一体化的背景下生成的，然而，开放的果实决不仅仅是慷慨激昂的开放之心所能摘取的。

三、“跳出”结论的历史观 选择现实的命运观

迄今，当代领导不应停留在“是大众创造历史”，还是“创造者创造历史”的争辩中，也不应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现成结论，而应当首先审视自身是否具有“历史主人”的角色意识？能否具备创造历史的责任能力？与其把社会时势看成一种客观现象、历史条件、现实状态，不如把它认作一种发展能源、转换契机、内在动力的集约模态。由此理智地顺应历史潮流在心理深层培植和确立一种科学的全新的历史观、命运观和事业观：

——当代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健康心理和卓越才能的现代化领导人才，领导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心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的主导因素。但是，决定和支配社会发展和事业盛衰成败的不是某一开明的个人和集团，而是时代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历史需要当代领导必须立本于发展生

产力、健全改革运行机制、创造新型的经济政治体制。唯其如此，社会的前进才能获得比任何开明的豪杰更为强大的动力；唯其如此，当代领导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心理转换，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当代领导具有把个人的命运同中国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品质，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不懈。同时，历史运动的结果与个人的升迁荣辱并不是一条绝对的平行线，它需要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这就要求当代领导又要具有把个人命运同历史命运相区别的意识，确立随时准备以个人的奉献、牺牲换取事业成功的无私无畏的心理品质，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欣慰，以先人“试误”换成功，以先人创造立“丰碑”。

——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一代新人走上领导岗位，改革成功的基因在于保证领导者成为自由创造者，改革者成为现实领导者。一代改革精英的出台是改革盈溢活力，得以顺利推进的基干和象征。但是在十亿人民中她们始终是少数。改革真正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是人民，是领导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条战线的民众结成的新的共同体。唯此，才能使改革不失为一种新的伟大的历史进军，也才能使中国真正地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的风姿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1.2 领导心理并非历史的被动感应

当

我们论证了历史的变迁、文明的演进，皆非人格化权

威主导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权威、英雄、领导者，他们与历史只能是“奴——主”性关系吗？他们的个性特征、个性倾向性只能是应境而生、顺变而应的感应器吗？这又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理性思考。

当今，人们对科学价值的理解，不仅在于人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而且主要在于对人自身和人与客观关系认识的深化。即使是一些成就卓著的自然科学家，也不再纯粹地去研究自然界，而对人及领导人的研究尤为关注。从事工业系统研究的荷兰的 A·f·G 汉肯博士，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著成《控制论与社会》一书。书的前言在谈到模型、结构时指出：“最重要的成分是人，也即决策者或行动者。”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社会系统”。

人类是凭借自身具有自由创造特性的心理机制成为万物之灵的，同时又是凭借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群体活动繁衍生存、不断发展的。在社会变化的运行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意识的巨大作用，也可以发现那些人类领袖人物的闪光的足迹。在社会变化的速缓中，显示着人类意识的超前性或滞后性，也显示着领导心态的激越力或滞化力。领导心理是社会规定性和现实能动性的统一，要认识这种状态和特性，就需要从领导心理在社会系统机制中的层位、特性、作用、动因及趋向等方面去寻根和辨认。

一、领导心理在社会系统机制中的层位

社会机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指人类有目的地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现实程度和质量的状态。它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客体是整个客观世界。它的一切过程和最终结果

都不是离开人的活动而自然生成和发展的产物，而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及其所取得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财富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程度、质量的有机整体。

社会系统机制，概略地说，可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同时，由于社会制度是这两种形态的结合体，它既适应物质形态的物质生产关系，又适应精神形态的精神生产关系，因此，社会制度在社会系统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具体地说，社会系统机制可分为五个子系统：一是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状态。这是整个社会系统机制的基质。二是由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它决定着社会系统机制的性质。三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制度。四是由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形成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一种低层次的、感性的、直观性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客观内容的反映和积淀，它包括社会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意识、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内容。五是在各种社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体系。它是系统化、理性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自然科学、思想、艺术、文学、美学、哲学、教育、宗教等等。这五个子系统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形成一个整合的社会系统机制。

领导心理是整个社会系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基础上，在领导活动中产生的，介于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一种带有政治色彩、决策因素和管理机制的社会意识。领导心理与社会心理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其联系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二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一种自发直观的、不尽系统深刻的反映形式；都是社会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结构上都是由比较稳定的形成物（如民族性，传统的观念、习惯、风尚等）和敏感易动的形成物（如需要、情感、态度、意志等）两部分联结组成的形态；都具有促进社会思想体系形成、发展和更新的作用，都具有对社会变化积极支持或消极适从的二重性效应。从这种联系的意义上说，领导心理是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其区别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形成的范围有所不同，领导心理主要是在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领导活动中产生的，他们的角色知觉意识和心理过程以及个性倾向性都与一般社会成员不尽相同。二是心理结构成分的质有所不同，领导心理较一般社会心理的“稳定形成物”和“动态应时性”更带有政治的色彩、理性的机制和管理的属性。三是作用的强度不同，领导心理对思想体系的形成更具有直接的作用，并通过领导行为方式对群体施加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领导者非权力性的影响力既深且广，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说，领导心理既是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中介，又是沟通社会政治意识与社会存在的纽带和桥梁。

从当前改革的社会实践上看，领导心理与社会心理是互为联动的，当代领导心理机制中的新质层次，与亢奋的时代精神和健康的社会心理是相维奔放的。改革作为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必然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北京市总工会对 28280 人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并支持改革，群众切望领导者成为改革的表率。人民呼吁改革，投身改革，

这是当代领导心理环境的主旋律。河北邯郸地区在全区 321 个企业进行招标承包。其中，干部中标的 260 人，工人中标的 58 人，农民中标的 3 人，通过招标发现企业领导的后备人选 400 多人。重庆红岩机械厂招标一人，投标者达 157 人，其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大学生，还有一名幼儿园的阿姨。现实是最令人叹服的心理指标。它说明，领导者既是自足独立的个体，又是社会结构中某一层位的代表，总体的社会心理变化孕育和促动着领导心理变化，领导心理变化又对社会心理变化起着主导、促进的作用。

同时，随着改革的进展而不断增强的社会各界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有力地促使当代领导从掌握历史主动性上思考问题，养成在民主气氛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性，造就与建设民主政治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一个时期来，不少专家、学者感叹：群众政治参与意识极其微弱。国外一些观察家也纷纷发表评论，大谈所谓中国的“经济热”取代了“政治热”，“出国潮”淹没了“爱国心”。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也提出系列报告：62.41% 的公民表示：“对谈论政治问题，我很谨慎”；73.76% 的公民倾向于“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众多的人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在改革过程中，一些领导者也感到：经济搞活了，政治淡化了；责任强化了，人心搞散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们摆脱狭隘地在“乱”与“治”中理解政治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现：那种“政治淡化论”，是把政治行为误解为过去那种大诛大伐的“政治运动”，于此，政治参与意识也就变成了“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代名词。这种“淡化”倒正是对政治运动的反悖，正是一种在压抑反变中重新思考政治